◎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一本抗战题材小说，在日本竟然连续再版11次，被上百个大学收藏——

李广田《引力》在日本

吕彦霖

《引力》初版本

《引力》的诞生及现实际遇

中国现代作家李广田以诗歌与散文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抗战时期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长期中断。据李广田之女李岫回忆，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写完最后一句话”。作为一部用力颇多的心血之作，《引力》与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一起，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引力》讲述了身居沦陷区的中学教员黄梦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丈夫雷孟坚的召唤下，毅然带孩子设法离开沦陷区，去寻找光明的故事。当她历尽艰险到达丈夫居所时，丈夫却已离开，只留下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在丈夫行动的感召下，黄梦华也终于放下个人得失，告别旧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较之大名鼎鼎的《围城》与《寒夜》，《引力》在国内所受关注十分有限。小说连载期间，除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罕有评论文章。1983年小说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引力》在国内研究界的持续“遇冷”，除文本风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不同于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抗战题材作品，《引力》内容琐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写与风景刻画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缺乏对宏大叙事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对沦陷区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与当时抗战文学的主流写法有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长期游离于读者及文学研究界视线之外。但正是这样一部别样的抗战题材作品，在日本却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与研究

《引力》在中国发表后没几年，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高田浩的另一节译本登载于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陈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说还有1959年版，期间连续再版了11次。

中国研究所《引力》译本

这部小说不仅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也备受专业研究者推崇。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现有114个大学藏有《引力》1952年版，11个大学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该书译者冈崎俊夫外，学者吉田浩、立间详介、奥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为其撰写过书评或研究文章。另外，该书还入选了多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如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忍在其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版）一书第六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将《引力》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为沦陷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国中的异国（其二）——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评介。国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编写的《文学中的教师形象》（明治图书出版1957年版），以《占领下的教师苦恼与行动——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对《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其一是对小说“抵抗文学”特质的揭示与阐发。立间详介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指出：“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在他看来，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唤了梦华的顽强行动，最终使她走向崭新的生命状态。小野忍则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梦华突破了普通人对家庭的耽溺情绪，进而“从个人转向团体，由团体走向了大众”，最终收获了可贵的国民意识。而佐藤普美子在《让“衰颓之物”言说吧——试论：李广田文学的定点》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为抵抗文学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引力》也体现了李广田一贯的将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创作倾向。在她看来，这种“去概念化”书写取向及其“质朴、恬淡”的笔调，无疑是小说能够引发日本读者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对小说“自叙传”风格的发现。譬如译者冈崎俊夫就发现了小说强烈的自传性质，他在译后记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发表了《西行记》，这是记叙抗日战争时期迁移至内地时沿途观感的记行文学……这正好跟《引力》中孟坚的行踪相同。”李岫回忆说，她1992年即将离开京都外国语大学之际，将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及父亲李广田的文集捐赠给校方，在交接仪式上，知晓她身份的到场学者们纷纷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黄梦华之子）之名称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和她的对谈中，也多次谈及他们对《引力》所传递的“和平理想”的喜爱，这从侧面印证了小说的巨大影响。其三是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分析，小野忍认为《引力》庄严与柔美兼备，梦华在离开沦陷区前的最后一课，“使人想起被选入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李广田在描绘梦华精神蜕变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纤细柔绵的笔触……差一点被日本读者误认为作家是一位女性”。

1952年日本岩波书店版《引力》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缘何在日本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引力》成为日本读者和学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窗口？在笔者看来，理解《引力》在日本的传播热，不仅要考虑小说本身的美学风格与日本读者审美接受之间的契合，更要将这一文化传播现象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

在阐释自己的美学主张时，李广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强调自己“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两种小说》）。这种美学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现沦陷区生活时立足个体亲身经验，坚持秉笔直书，保留了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体验的生动细节。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倾向也使得小说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未对侵略者作漫画式处理，而是倾向于写出其复杂的一面。这种“以真为尚”的美学风格，无疑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现战争残酷性，呼唤中日两国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显然契合了战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诗化小说，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意想象与东方情韵以及小说家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密呈现，都与日本大正年间兴起的“私小说”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松散、琐碎、富于流动性的写作风格，与日本人重视情绪刻画，偏重内心省思的文学传统多有契合，因而也易为日本读者所欣赏。

《引力》的接受热潮更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战后日本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左翼运动的广泛兴起，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广田的民主战士身份以及小说中对解放区的反复隐喻，自然会激发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日本民众体会到了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滋味。正如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引力》在日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学界重视的现象，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充分说明，作为一部揭露战争给人民造成创伤与灾难的反战小说，《引力》写出了人类的共同心声，具有超越时空与国别的价值。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讲师）

◎新作评介

时代巨变的生动描绘

——读龙平平《觉醒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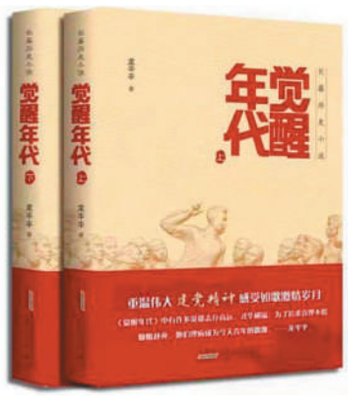
阎晶明

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关注与热评，“觉醒”成为贯穿全年的热词。百年前，一群觉醒了的中国人，成为为劳苦大众自由解放而激昂奋起的革命者，成为深邃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先进知识分子；百年后，他们的作为广为传颂，使百年历史融为一个整体，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薪火相传。最近，编剧龙平平根据剧本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再续热点，与读者见面了。

小说再现了历史巨变前夜的思想萌动。作者以全新视野，回溯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塑造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找出路而艰辛探索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蔡元培、鲁迅、胡适等觉醒者为唤醒民众觉悟所做的文化探索、学术研究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努力，表现了这一群体在思想、文化和现实斗争中不懈奋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品格。作品引入新旧文化人物的对垒、争论、斗争及适度的理解、通融，叙述了他们在社会斗争中的壮怀激烈，个人命运上的曲折多变。作品深入人物灵魂，描写新旧文化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叙写他们为国家、民族和大众付出的牺牲与代价，这种代价里有现实生活中的清贫辛苦、爱情婚姻上的隐忍服从，更不乏至亲之人的生命付出。

小说敏锐、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转型期的关键词。翻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觉醒”二字出现频率很高。一代先贤或留学日本、欧美，在比较中感知东方大国的沉睡与沉沦，或身处灾难深重的中国，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状揪心、痛苦。最早的觉醒者追求的不是自救，不是以逃离的方式去寻求个人安逸，而是通过苦苦求学获得知识和真理，探求民族解放之路。他们是革命者，也是牺牲者，他们勇敢无畏，同时又不乏自我冲突和相互间的矛盾。龙平平依靠深厚的学养、精深的研究、精巧的构思，用“觉醒”这个关键词概括历史转型期的思想萌动，展开一幅新旧观念、中外文化在激烈碰撞中引发的社会巨变图。

小说紧紧围绕影响历史的人物展开叙事。将政治风云、文化变迁、社会变革、军事斗争融为一体，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溯百年前的历史，既做整体观照，又为具体人物确定相应位置，既非简单按人物后来的政治地位定位，也决不跟风去做“民国范儿”的逸闻趣事表达。小说中的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观念互有差异，观点时有冲突，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黑暗中的旧中国寻找新路，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炽热的家国情怀。即使是旧文化阵营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他们的顽固也一样被活化出一副“忘我”的固执。新旧两个阵营的斗争，同一阵营里的冲突，个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在小说里穿行交织，将“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中国文化阵痛描绘得淋漓尽致。



小说展开了一幅丰富立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割据混战，“五四”游行的鲜活情境，都写得活色生香。尤其是对火烧赵家楼的充满戏剧性的场面描写，令人过目难忘。这种将纪实性、戏剧性、小说性融为一体的写法，缘自作者对史实的熟稔、情感的投入和技巧的成熟。小说还在人间烟火中凸显时代风云。赵纫兰之于李大钊，高君曼之于陈独秀，江冬秀之于胡适，以及虚构的青年女性柳眉之于陈延年，无论她们的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斗争参与度有多大的差异，无一不提供了在生活中观照时代的有效视角。此外，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性格的刻画，陈氏父子代际冲突的化解，反派人物张丰载的塑造等，都强化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动感强度。同时，小说努力还原真实历史场景，对饮食、服饰、书画、语言的精确把握，让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图景更加丰富、立体。

小说在宏阔的描写中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主题。《觉醒年代》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作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以及在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的充分准备。人物的主次层级，故事的详略铺陈，戏剧化情节的开合收放，均在这一主题框架的统摄之下。各种主题变奏和故事插曲和大小情节的枝蔓丛生，并不影响读者获得一种整体观。从痛感国家落后到为唤醒民众觉悟而呐喊奔走，从《新青年》的创办到实现组织建党，涓涓细流汇聚成磅礴力量，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感受青春热情、感悟责任担当、接续奋斗精神的激情之作。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奔跑追梦人》寻觅改革开放动力

本报电（文一）作家李朝全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追梦人》近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书写深圳优秀人才创新创业的故事，奏响“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这一新时代乐章，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弘扬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尚，激励人们勇当新时代“追梦人”。

为创作此书，作者多次深入深圳市采访，从许多深圳人中选取了作家杨黎光、中科院院士黄三文、海归创业者林海晖等来自文艺界、科学界、商界等各行业近30位人物，用群体素描的方式刻画了一大批“平凡”却又可敬的奋斗者形象。从这些年富力强且充满朝气活力的人才身上，作者找到了深圳发展的奥秘，也找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两大动力——人才驱动、智力驱动。

把快乐转赠给未来

——读阎志长篇新作《武汉之恋》

於可训

阎志的长篇小说《武汉之恋》，可谓倾其生活积累，写尽了他近40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部小说共5卷，用近50万字篇幅，塑造了田路、陈东明、雷华、吴爱军、王慈等青年创业者形象，再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搏击奋斗的历史。

《武汉之恋》是一首献给青春的颂歌。在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春颂。《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等，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青春颂。《向困难进军》《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和《欧阳海之歌》等，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青春颂。《武汉之恋》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青春颂。书中人物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洪流，挥洒青春的激情和力量。田路在大学时只身漂流长江，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陈东明大学毕业时在校园勒石为铭，刻下一个“始”字，誓言从脚下开始。正是这种萌动的青春和飞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无畏的精神和非凡的魄力。

《武汉之恋》是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创业史。与柳青《创业史》的时代背景不同，《武汉之恋》表现的是现代资讯高度发达、科技竞争激烈、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如何奋起直追的故事。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雷华在图书馆偶然读到一本《硅谷之光》，萌生了创业想法，两年修完学分，走上自主创业之路，成为东岭软件公司总经理，开发了风行一时的一诺手机；陈东明从一则新闻报道中得知国外拍卖行拍卖中国文物的信息，毅然辞职下海，成立了正和拍卖公司，后又在日本捕捉到当地保险业信息，回国成立了民营保险公司。两次大胆尝试，使他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品中的这一代创业者，其创业选择固然包含个人因素，但更着眼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趋势，作者在书中突出了他们的创新创业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武汉之恋》谱写了一个新的当代英雄谱系。书中的科技精英、商界巨子，何以英雄？他们有忠，是忠于国家民族，历史使命，时代召唤；他们有勇，是勇攀科技高峰，敢闯市场盲区，创造商界传奇。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但又不像莱蒙托夫笔下的贵族青年那样，只满足于一些内心的渴望和空洞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田路的创业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毅然放弃毕业分配的工作，与几个同学创办公司。为了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尿激酶，他们每天拖着粪车，在大街小巷的公共厕所里收集尿液。在公司上市、集团业务蒸蒸日上时，又离任转向公益环保事业。汶川地震时，他带领集团的年轻人，奋战在救灾一线。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他们身上集中了我们时代的可贵品质——不止息的追求，不停顿地创造，不拒绝任何细小的开始，不放过任何瞬间的机遇。

《武汉之恋》还是作者献给近40年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部教育诗。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毕业生。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不但影响了他们的学业，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作品中多次写到陈东明、田路等人在校期间发起成立的“跨学科沙龙”活动，就是教育改革在学生身上的一个全息投影。沙龙活动中各种思想自由碰撞，各种创造性构想的萌芽，各种人生目标的规划，包括组织、活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等，都为他们走出校园后的创业活动奠定了基础。《教育诗》的作者马卡连柯说，人类生活中，真正能激发人的创造热情的，是对“快乐的未来”的憧憬。这些毕业生们把这份快乐转赠给未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幅“快乐的远景”图画。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段华与《孙犁年谱》

王江江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重要作家。他深谙立身为文之道，作品不同凡俗，迥异时风。他的创作生涯有两个高峰，早年的《白洋淀纪事》清新俊逸，晚年的《耕堂劫后十种》沉郁顿挫，滋养了一代代读者，启发了众多作家，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均受其影响。孙犁开创了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流派“荷花淀派”，如今，这一流派的独特价值和文学意义在时间的积淀中愈发凸显。

在孙犁逝世20周年之际，国内首部《孙犁年谱》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计40多万字，全景展示了孙犁的文艺生涯，系统梳理了孙犁的创作脉络。书中收录了《孙犁全集》未收书信、佚文多则，同时对以往资料中的一些错讹进行了订正，是一部孙犁研究的拓荒之作。书中第一次披露孙犁写《铁木前传》时摔伤的准确日期为1956年3月29日，此事对他之后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从此开始了长时间的养病生活。该书还首次披露了很多绝版资料，如《善闇室纪年》摘抄手迹。

《孙犁年谱》编者段华是孙犁的忘年交，16岁即与孙犁相识，孙犁晚年很多作品的创作过程、素材原型和交往活动，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30多年来，段华致力于史料搜求，曾于北京军区战友报社资料室，找到保存着的唯一一份《抗敌三日刊》合订本，并从中查到了孙犁《连队写作课本》等好几篇文章。段华长期追踪和搜集孙犁资料，潜心研读，终于集腋成裘。

追寻孙犁的人生道路、探索孙犁的创作奥秘，是众多作家、学者和孙犁作品爱好者的愿望，《孙犁年谱》为他们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和研究依据。该书的出版，对孙犁研究和普通读者走近这位文学大家，都将有所裨益。